



清光绪末年的赣南教育

□ 赖婷

光绪,是清代最特殊的年号之一。刚刚走出太平天国阴霾下的清朝,面临着西方列强如八国联军等的侵扰,而在广袤的土地上更是遭受着连年的天灾。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改革孕育而生,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孙家鼐等人主持了京师大学堂和全国各省新式学堂的系统成立计划,“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深感教育强国的重要性,再令张百熙重启教育改革之重任,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后张之洞等又参与其中,方才出台正式制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成立学部。赣南的近代教育改革也就此拉开。

致用中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吉南赣南道巡道周浩在濂溪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致用中学堂。据《赣县新志稿》记载:课程特重算术,教习一人指导,之余与书院同。该校虽为本县创立新学之最早者,然影响甚微。1900年因清廷守旧,不用“学堂”二字,改称致用精舍。创立者为何人,今已失考。1901年停办。

赣县普通小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赣县知县张之锐与邑绅刘景熙将县立莲书院改办赣县普通小学堂。翌年开学时,朝廷的学堂章程尚未颁布,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据,于是自行订立了章程,将府立阳明书院改为小学,实则为中等教育,学生皆成年人,分两班:头班收生员,二班收童生,每班各20人。膳宿由学校供给,课程分中学、西学两门,各聘教习一人。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遭解散改组为高等小学。

赣州府中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赣州知府查恩绥与邑绅刘景熙将府立阳明书院改为赣州府中学堂。翌年开学,虽然中学与小学的学习内容不相衔接,但课程编制大体相同,只不过就学者的年龄有差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照学部章程改为正式中学。后由省府接手办学,改名省立第四中学(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

虔南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吉南赣南道巡道刘心源与邑绅刘景熙将道立濂溪书院改办为虔南师范学堂,此后先后易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赣县中学、省立第三中学,后又改回省立赣县中学,之后易名省立赣州中学,1953年改为赣州市第一中学。

蒙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赣州知府查恩绥从事革新,课程编制照朝廷颁颁章程办理,将原有蒙学堂改称为赣州某坊初等小学,城内外共设立6所,经费由府中筹措。是年冬,知府关榕梓(接任查恩绥)表示,“以知府而办小学有损威重,乃披归县办,经费亦由县筹拨”。

教育大家

刘景熙,字敬居,赣县王母渡乡交口村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礼部主事。不久,授广西知府,以母年迈无人侍奉而未赴任。主张教育救国,建议濂溪、阳明、爱莲三书院改设为师范小学堂,为赣南新学创始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西委设江西农工商矿总局,刘景熙为总局协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西商务总会成立,公举刘景熙为总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景熙继任江西铁路公司总理,后加入同盟会,与同盟会另一主要成员张周垣创办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赣报》。著有《濂溪文集》五卷和《诗集》一卷流传后世。

刘心源,名文申,字亚甫,号冰若,亦号幼舟,湖北荆州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历任顺天府同考官、河南学政、成都知府等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吉南赣南道巡道,后任广西按察使等。宣统元年(1909年),刘心源当选湖北省商办、铁路协会会长,1912年当选湖北省临时议会议长(1916年改为省长)。他精研文字,以金石为基础,为官四十载,于金石亲采精拓,校录博研,从无间断。与杨守敬、张裕钊被张之洞誉为“湖北三大书法家”。

刘树堂,赣县王母渡人,原名刘诗村,字晋钦,晚年号愚山。幼年喜爱读书,长大后弃学经商,成为清末民初赣南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树堂在赣州城府前街开办日新公司,经营有关文化的业务。同年11月,出版发行《日新汇报》,创赣南报纸之先河。1915年,巴拿马举办国际博览会,刘树堂任博览会参事,并任江西参事产品审查长。由于他认真负责,江西产品在博览会上声誉大振,为家乡争得荣誉。被当时的政府授予三等嘉禾勋章。1918年,刘树堂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9年,刘树堂荣获二等嘉禾勋章。同年,美国人毕克同我国合资组建中美实业公司,刘树堂被选任该公司董事。

乡愁与荣光的历史回响

——赣州会馆的历史演进

□ 穆宇清

历数会馆谁是翘楚

赣州是江西的重镇,又是江西南部的首府,闽粤门户,物流通衢,商贾集于此。一百多年来,商贾会馆纷纷兴建,最知名的是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南临会馆,此外还有浙江、陕西、吉安等会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会馆的“江湖”中,百姓们给各个会馆也排了个座次——“南临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安徽会馆平平过,福建会馆豆腐渣。”

被吐槽为“豆腐渣”的福建会馆,查阅史志可知,最早应在章贡区龙船庙巷(今和平路)。据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记载:“由西北向东南,清代依次名为下龙船庙、上龙船庙、侍臣坊。”所以,这条巷子便有了上龙船庙与下龙船庙之分。在下龙船庙南侧原有一座天后宫古庙,后来拆了庙,改建福建会馆。据称,福建会馆建筑极其精致,颇显古典,与“豆腐渣”的评价可谓相去甚远。新中国成立前,一度成为消防队的驻地,后在打造宋城公园时被拆。

“平平过”的安徽会馆即新安书院,位于章贡区梁屋巷。新安是徽属六邑(即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江西婺源六县)的总称,因六邑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曾置新安郡而得名。新安书院自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迁建至梁屋巷,嘉庆六年(1801年)续建。20世纪一二十年代,安徽商帮将其购下,书院便悄然转身,成了一座往来照应的会馆。岁月剥蚀,书院二三进皆已湮没,只存有青石牌坊诉往事。所幸,尚有第一进歇山式殿堂留存,那流金的木雕雀替与彩画依稀吐露着旧日的精巧。院落中的青石早桥和两厢的附属建筑上,雕有神态各异的瑞兽,砖墙上刻着的“新安书院”铭文,在风尘中渐渐黯淡。

连安徽会馆如此精雕细琢也被称为“平平”,那么被誉为“一枝花”的南临会馆自然不同凡响。南临,指的是明清时期南昌与临川两地商人在赣州合建的会馆,原位于章贡区中山路上,是南临商帮往来赣粤二地经商聚会的重要议事点。该馆于2000年被拆除,很可惜,查阅已知资料没有找到更多对它的描述,却不由得让人愈加浮想联翩。

而最为百姓称道的广东会馆,至今犹存,风采依旧。广东会馆位于章贡区西津路田螺岭巷口,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是清代广东省旅赣同乡会馆,属赣州七大商帮会馆之一。这是一座具有典型岭南风格建筑,背依郁孤台,坐北朝南,南北长61.9米,东西宽19.8米,砖木石混合结构。三路三进三开间布局,建筑木石构件用料讲究,柱础、台基等石构件上有精美花草、人物、动物浮雕,屋脊灰塑装饰、琉璃盖瓦。广东会馆不仅是会馆中最令人瞩目的那一座,也是赣南大地上华美的建筑诗篇,是值得反复品读的杰作。

除了这几所在历史上留下闪光印记的会馆,赣州市中心城区至今还能看到几座县级会馆。名声在外,且一直被使用的是筠阳宾馆。

居于章贡区灶儿巷23号的筠阳宾馆,是明清时代高安籍在赣州做生意的商人集资建造的公共建筑,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兼营客栈业。虽名为“宾馆”,实属“会馆”建筑形制。高安古称筠州,县城称筠阳,所以又称高安会馆。三进两天井、约880平方米的院落被院墙轻轻拢住,自成一方天地。外立面以风火墙守护平安,内院多以木扇为隔,阳光透过窗棂描摹精雕细刻的图案。临街入口处,一袭木门罩悬着旧日风雅,门额上“筠阳宾馆”四字端庄依旧。两侧对联将“筠”“阳”二字巧妙嵌入联首,“筠节挺生美饒竹箭,阳和布覆香暖梅开”,浸透岁

月的温柔静好。穿过厅堂,在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的平棋上是“福”与“喜”两个鎏金大字。阳光漫过瓦檐,金字便会微微泛光,仿佛激活了一百多年前的美好愿景。岁月流转,商号渐息,这里慢慢成了一方民居杂院。商户的后裔仍有人居住于此,老一辈交谈间,那口高安口音依稀可辨。

章贡区大、小新开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可谓会馆云集,除了龙南会馆,还有大余会馆、于都会馆等,此处不多赘言。

最忆江右万寿宫

贡水汤汤,自石城县石寨蜿蜒而出,一路收纳溪河,汇聚成流,奔涌至章贡区,与章水合为赣江。在过去,常见巨木扎成的长排,如沉默的黑龙顺流而下,号子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着水波荡开。数百年来,这条水道,是无数人致富的通道,也是无数人命运的险途。在章贡区七里镇七里村的炊烟与绿树间,悄然矗立着一座官庙,仿佛江上旅人的锚,从此稳住心神,放手一搏。那便是万寿宫了。

万寿宫,是一则属于江右商帮的传奇。江右商帮纵横四海的足迹与精神版图,从不缺少万寿宫的身影,甚至当江右商帮成为历史标记时,它依旧伫立在当下的时光中。

其实,历史上的万寿宫曾有三种类型。但在所有的万寿宫中,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江西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万寿宫远非一座单纯的庙宇,而是集神明庇佑(供奉江西地方保护神“许真君”)、乡谊联络、商事互助于一体的江西人的精神坐标。自元末明初兴起,一直延续至清朝的江西移民潮,让江西商人如同随风播撒的种子,遍及全国乃至走向海外,落地生根。而这万寿宫,便是他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与身份印记,乃至有言道:“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万寿宫。”

七里镇的这座万寿宫,始建于明代。明代以来,七里镇贡江河畔一直是赣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贡江上下11个县市的良材,皆汇集于此。巨大的水排,闯赣江,过鄱阳,入长江,直抵繁华的上海与江浙。这是一条用勇气与运气搏杀的黄金水路,也是一条危机四伏的生死航道。于是,往来此地的江西商人,连同闽、粤、江浙的同业,共同集资筑起这座官观。他们将新坡治水、护佑安宁的许真君奉为行业保护神,将所有的敬畏与祈愿,都凝结在此处的一砖一瓦之中。

这座万寿宫规模宏大,三进式砖木结构,坐北朝南,进深96米,面阔45米,高耸的风火墙将其严谨围合。格局设计也颇具匠心:第一进为戏台,方寸之间可跨越山海,演绎人间悲欢离合;第二进为九如堂,八根柱亭衔接院落,天宝寺和三观殿静处院中;第三进为高明殿,神位俨然。在很长岁月里,它被誉为赣州城东一带寺庙之首。

奇妙的是,这座因商业与生存而兴建的官庙,却展现出惊人的包容。道教与佛教元素在此和谐共处,共享香火。这种交融,呈现的是民间最质朴的虔诚——崇敬所有能给予心灵慰藉与希望的存在。

官观亦如那江水,难免起伏的命运。继清咸丰年间维修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万寿宫毗邻之地建起现代化的贮木场,而它却渐趋老去,戏台倾颓,梁柱斑驳,一度危如累卵。幸得抢救性修复,才得以恢复往日面貌,1988年被列为赣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留存下一脉厚重记忆。

江水蜿蜒,亦有转折。2020年,为系统保护与挖掘七里镇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其独特的古窑文化,赣州市启动了《赣州市七里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万寿宫也被纳入整体保护与复建

的范围中。2023年9月,以历史文化为内核的“七经古镇”文化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历经沧桑的官庙,也终于在精心修缮后,以完整风貌重新面世,继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往来故事。

会馆的没落与淡出

聚拢南来北往的乡音,装满关乎生计的希冀——会馆,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地相聚中,从一处异乡的屋檐,成为商人的“此心安处”。用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漂泊的个体与遥远的故土相连,既维系了乡缘,也融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当夕阳的余晖隐没在风火墙背后,昔日喧闹的厅堂也随着金乌坠地变得沉寂。随着封建王朝的背影远去与现代经济的浪潮涌来,传统商帮与会馆的黄金时代,也如同庭中那株桂花树一样,时序轮转,花开花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着一纸《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的颁布,一种全新的、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商会,开始在各地萌生。与会馆浓重的同乡色彩不同,商会是跨地域、跨行业的法团组织,旨在“通官商之邮”,其法律地位、组织方式和政治功能都远比武会馆先进和正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工商部向清廷提交奏折,获批设立江西省商务总会。宣统三年(1911年),江西省商务总会的新会址设在南昌合同巷口,内有江西劝业场,逐渐成为全省商务活动和商品展览的中心。之后,又改组为江西南昌总商会,于1913年5月3日加入全国工商界联合会。

彼时,传统商帮与会馆仍有一定生存空间。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虽暂允同业公会、公所及会馆等旧式团体并存,但要求其章程备案,已显规范与整合之意。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所有工商组织都改组为同业公会。同一区域内7家以上同业发起,经官方核准即可成立同业公会。这一制度强调行业共性,弱化地域纽带,至此,使得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商帮失去了法律依据和生存土壤。与此同时,会馆原有的商业联合作用也彻底让位于新的制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遍布城乡的会馆,随着时代的激流,漂向了不同的彼岸。

广东会馆经历了风暴般的革命岁月。北伐战争期间,它被用作赣州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所在地。1926年11月3日,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陈赞贤当选总工会委员长,成为赣南工运史标志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它又化身染织厂厂房,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议事声,见证着新中国经济的勃发。如今,广东会馆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经2014年全面复原整修后,被纳入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

筠阳宾馆以宾馆的形式得以存续至今保存较好。1945年,抗战胜利后,安徽籍旅赣商人利用新安书院(安徽会馆)及其公积金,在此创办了私立新安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南临小学合并为中山小学,后来又开设过幼儿园。

更多的会馆,则命运多舛。或建筑荒废,倾颓于蔓草之中;或遭拆除,徒留泛黄的记忆;或转为普通民居,在烟火气里模糊了最初的容貌。它们的不同归宿,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近代以来赣州经济社会变迁的复杂轨迹。

如今,当我们走过那些得以幸存的会馆门前,抚摸那些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柱与门墩,仿佛仍能听见旧日鼎沸的呼声。它们不再忙碌于计算盈亏,却成了乡愁的容器、历史的注脚,温柔地提醒着往来的人们:有些故事,应当被聆听;有些光影,值得被看见。



漫步赣州老城,随意步入一巷陌,或许会遇见一座安静的古建筑。

门脸不大,匾额隐约透着当年的气派,檐角椽头亦有几分不同寻常的张扬。打眼看去,它既不像祠堂,也不像民居——它曾是会馆。

明清时期,这类建筑曾汇聚四方人烟、运转南北货物,商人们风尘仆仆背着行囊在这里落脚、议价、结盟,也在这里抱团取暖。它们是富有故事性的存在,也是赣州商业记忆生动的注脚。不经意间矗立在闹市或静巷,等候每一次邂逅与探寻,然后向人述说,赣州曾有过的熙攘与包容。

交相辉映的双子星

会馆因何而生呢?

如果你是一位明清时期的商人,背负着家中大部分钱财换来的货物,跋山涉水到异乡做生意,会遇到什么?首先,人生地不熟,可能语言也难通;其次,客栈房钱昂贵且人多眼杂,货物不敢离身,又哪得空去寻买家。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做买卖势单力薄,既容易被本地商人排挤,又难免遇上“地头蛇”吃拿卡要。若是碰上生意崩盘、患病求医之事,更是独木难支。所以,要想做生意走得远,“抱团”是必须的。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形成,地域性商人群体——商帮也趋于兴盛,著名的有晋商、徽商、浙商(含宁波商帮)、陕商、江右商帮(赣商)等。商帮的本质,是同乡的商人为了能在他乡站稳脚跟,通过聚力成势而自发形成的团体。商帮兴盛了,自然需要有个“据点”,毕竟,商帮这个联盟相对松散,需要一个维系乡情和生意的场所,也需要有人帮忙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于是,商帮所到之处,会馆应运而生。据目前已知史料记载,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当时,安徽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创建了芜湖会馆,以此为在京同乡人提供食宿之便。

《中国会馆志》有载,明清时期,移民相对集中的两湖、西南地区,移民移入的高峰期往往也是会馆建立最多的时期。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提到,北京那邑会馆统计中西会馆的数量最多,并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江西特殊的文化与制度传统。

随着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置办得越来越成熟,组织、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它们也慢慢有了各自不同的趋向:一种是由旅居外地的同乡人建立的“同乡会馆”,老乡平时聚一聚,互通有无、巩固乡谊;另一种则更像是“行业会馆”,为从事同种贸易的商人牵线搭桥,促进大家合作共赢。这恰好体现了会馆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前期重在联络感情、彼此照应;后期则更注重商业协作,功能上接近行业公所。

会馆远不只是老乡们聚会的“乡土组织”,它与明中叶以降远距离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路如血脉般向远方延伸,星罗棋布、熠熠生辉。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和商帮就像是明清时期因经济蓬勃发展而诞生的双子星,交相辉映,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商业与社会面貌。